

当代西方文论的
政治转向研究



范永康 ◎ 著



当代西方文论的
政治转向研究



范永康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转向研究/范永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203 - 3413 - 6

I. ①当… II. ①范… III. ①文学理论—关系—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0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592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瑞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序

近十年来，我针对当今文学理论的衰落和文学研究的低迷状态，提出了一个“后理论”的概念，这正好与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的题目类似，但是我们各自所指的对象不同。我当时注意到，面对文学理论在整个世界的衰落，来自东西方不同阵营的学者也纷纷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而我的老朋友伊格尔顿的态度最为悲观。因此我提出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回应他的悲观态度。诚然，我本人作为一个持乐观态度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从未对文学理论的现状感到悲观失望。与其相反，我对文学理论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同时，面对文学理论在当下所面临的低迷状态，我们又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的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界总是听到“理论死亡”的噪声？文学理论的现状究竟如何？它的未来前景又如何呢？如此等等。这当然主要是出现在西方的状况。确实，令许多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西方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年代里，传统意义上的注重文学作品形式和审美特征的文学理论被放逐到了边缘，或者像碎片一样被淹没在文化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尽管如此，对文学理论情有独钟者依然不少，一些被文化理论放逐到“边缘”的文学批评家纷纷奋起抗争，试图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争得一席位。

置。这就是当代西方文论界的现状。

但是，我也在不同的场合说服我的西方同行，文学理论在西方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也不受重视。就好比文学在西方早就被人宣布“死亡”了，但它依然在高科技的电子时代存活了下来。尤其在当今的中国，鼓吹“文学死亡”或“文学理论死亡”者就更没有市场了。特别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途更有信心了。在文学理论界，随着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收入《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第二版，以及张江和米勒的对话在《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上全文发表以来，我们不禁欣喜地看到，中国文学理论的成就已经开始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和重视了。越来越多的原创性英文论文不断地见诸欧美主流的学术理论刊物，一些虽然用中文撰写的论著经过翻译的中介也开始步入英语世界，有力地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之格局。这当然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而言是好事，但我们也不应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国内仍有一大批辛勤耕耘的中青年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中国文论功底，同时也广泛涉猎西方文论前沿课题，并且写出了具有自己真知灼见的著作。也许他们现在还不甚有名，但他们的著述也许预示着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未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由范永康教授撰写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转向研究》就是作者试图回应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的一个研究成果。

作者阅读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大量著作，概括提炼出一个突出的学科理论倾向：文化政治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这是符合当今“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现状的。由此，作者聚焦这一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形成了从中国的视角与这些理论大家的对话。

但作者在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泛文化、泛政治倾向的同时，也认为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并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我想本书也或许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作者在书中还就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和理论建构，体现了作者致力于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勇气。

读完全书，我感到本书有下列三个特色。

其一，对当代西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倾向作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作者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并非简单地“向外转”，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前半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成果，努力做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形式主义与文化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兼容。特别是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作出了两点重要贡献：一是为我们揭示出主体位置形成背后的话语和权力的建构机制；二是启示我们，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主义的”身份，身份是可建构的，当然也是可改变的。即使文学理论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面向广阔社会文化现实，“在这场广泛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运动之中”，文学理论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显著的社会功能。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重新回到形式主义文论是没有前途的。

其二，本书花了很多篇幅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理论的现状以及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尤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擅长在宏观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社会结构论框架下进行社会、历史、政治批评，而对无意识、欲望、心理、身体、性别、种族、生活方式、日常文化等微观层面或中介环节的研究明显不足。我认为作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可惜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待深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当今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从传统马克

思主义关注的阶级政治，转向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非阶级政治的重视，如身体政治、性别政治、种族政治、差异政治、文化政治等，试图发展出一种能够适应“新社会运动”以来的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难免失之偏颇。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后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就没有意义，相反，这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此突出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从学理和实践上对之加以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我们反思、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譬如，他们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将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改造为比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从而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应该承认，这些观点的概括一方面是作者在对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这些观点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结论性，而在于其可以引发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由此我们便见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作者针对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以及整个文学理论方法和话语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在作者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仍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缺乏创新精神；二元思维模式；方法、资源单一。有鉴于此，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重建策略：第一，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第二，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价值标准。第三，重释“文学性”（架构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可以说，作者对这些建设性方案的阐释为我们今后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已失去了以往的那种活力和穿透性，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崇尚经验，并注重反思和质疑自身，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充分彰显其批判锋芒了。因而在不少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这就是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对“后理论”的描述和界定。但我认为，后理论概念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

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此外，“后理论时代”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文学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且不断地被人宣告“死亡”，但文学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前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它永远不会消亡，只是理论本身曾有过的“无边的”作用和不恰当的功能必须加以限定。理论应该结束那种大而无当的“泛化”状态，果断地回到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和批评上。这样，理论就永远不会失去活力和有效的作用。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后理论时代”解构了国际文论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国的古代文论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范畴和话语体系，因此在“后理论时代”进行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建设就要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对古代文论中仍有活力和阐释张力的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发掘和阐释，并尽可能地将其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和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使得长期以来已经“西化”的文论术语首先变得混杂，进而彰显其不同于西方理论话语的特色，最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范畴和话语体系。所以说，“后理论时代”既是大一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解构的时代，同时也是（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建构的时代。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到先锋的作用。由此可见，本书的出版应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的尝试。我应永康邀请，写下了这些文字，权且充作一篇序言。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引发这方面更多的著作和论文。

王 宁

2018年2月10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1)
引论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1)
一 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2)
二 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5)
三 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9)
四 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13)
五 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框架	(17)

第一部分 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

第一章 “权力论”视域下的文学与政治	(27)
一 “权力”: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核心概念	(28)
二 福柯的“权力系谱学”与后现代文论的政治转向	(31)
三 “权力论”影响下的文学与政治	(34)
四 走向文学的权力分析	(38)
第二章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39)
一 从“主体”到“主体位置”	(39)

二 福柯论“主体位置”	(42)
三 揭露“主体位置”的建构机制	(44)
四 “去除认同”:一项未竟的事业	(46)
第三章 走向叙事政治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政治转向	(48)
一 叙事理论政治转向的原因	(49)
二 政治化叙事的三大流派	(51)
三 叙事形式与文化政治	(55)
四 叙事政治学的未来	(58)
第四章 从心理分析走向政治批评:后精神分析文论的政治转向	(61)
一 精神分析文论政治转向的原因	(61)
二 从拉康再出发	(65)
三 政治化精神分析文论的三种形态	(66)
第五章 走向文学阅读政治学:文学接受理论的政治转向	(73)
一 政治语境和阅读构形	(73)
二 读者身份与差异阅读	(75)
三 意义累积和文本政治	(77)
四 文学阅读政治学评价	(79)

第二部分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文论

第六章 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逻辑	(83)
一 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	(84)
二 文化建构社会现实	(87)
三 文化建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	(89)

四 文化建构“主体位置”或身份/认同	(92)
五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评价	(95)
 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98)	
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	
“语言建构主义”	(99)
二 作为“机构/制度”(institutions)的审美意识形态	(102)
三 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106)
四 “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之必要	(113)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 (116)	
一 哲学的政治:从反映论到话语—权力建构论	(117)
二 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119)
三 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	(121)
四 阅读的政治:“阅读构形”理论	(123)
五 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政治学评价	(125)
 第九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128)	
一 从简单到复杂:思维模式的变革	(129)
二 两个核心观念的转变	(133)
三 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创新	(136)
四 走向复杂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141)
 第十章 “实在界”: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视角 (143)	
一 为什么要以“实在界”为视角?	(144)
二 穿越幻象—认同症候	(146)
三 从欲望图看“实在界”视角的超越性	(149)
四 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151)

第三部分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批判

第十一章 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构建与转型	(157)
一 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构建	(158)
二 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特征	(160)
三 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转型	(164)
第十二章 文学情感肌质的存在论根基:反本质主义	
文学观批判	(168)
一 陷入“语言牢笼”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	(168)
二 文学情感肌质的生存体验性	(171)
三 文学情感肌质的生命交往性	(173)
四 文学情感肌质的精神超越性	(175)
第十三章 走出“强制阐释”: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	(178)
一 “强制阐释”:理论时期的阅读模式	(179)
二 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	(181)
三 始于“审美判断”:审美阅读策略之一	(183)
四 关注“文学的质量”:审美阅读策略之二	(186)
五 重提“审美溶解”:审美阅读策略之三	(189)
第十四章 反对“强制阐释”与中国审美阅读学的兴起	(193)
一 反对“强制阐释”与倡导“本体阐释”	(193)
二 “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理论谱系	(195)
三 “中国审美阅读学”的理论创新	(198)
四 “中国审美阅读学”的发展愿景	(201)

第十五章 “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文学性”新论	(204)
一 从解构“文学性”到重构“文学性”	(204)
二 “纯粹美”与“依存美”	(207)
三 “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	(209)
四 两种文学性的辩证关系和结合方式	(212)
五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	(215)
第十六章 “诗的正义”:一个亟须重建的文学研究视角	(219)
一 “诗的正义”概念的两大缺陷	(219)
二 “诗的正义”:从“惩恶扬善”到“以美显善”	(222)
三 重释“诗的正义”的内涵与特性	(226)
四 “诗的正义”:文学研究的超越性视角	(230)
结语 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异质辨析	(233)
一 历史生成:“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233)
二 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	(236)
三 政治内涵:“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	(239)
四 文学观念:“审美化”与“去审美化”	(242)
五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	(245)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9)

引论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①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制度”^②。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① [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② Antony Easthope, *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129.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引论”部分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给予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一个宏观的描述，并对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框架做一个交代。

一 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①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②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②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①。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②。这些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③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尔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1980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④。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

^① 所谓“后革命”，即“在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结束了的一段时期，在‘后革命’时代，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但更多的则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对话”。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周穗明：《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马克思主义》，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美]L. 兰格曼：《西方新社会运动40年发展的理论总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④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页。